

沿着 斯诺的足迹

赵荣声 著

气象出版社

95030

沿着斯诺的足迹

赵荣声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6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个老记者为了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把自己多年来珍藏的已发表的通讯文章以及一些回忆录等佳作汇集成册,公开出版。作品涉及日寇入侵、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建国以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记载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场面,歌颂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风云激荡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伟大时代。本书适合于新闻工作者、文艺爱好者、广大青年学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斯诺的足迹/赵荣声著.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 1
ISBN 7-5029-2077-3

I. 沿… II. 赵…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4020 号

沿着斯诺的足迹

赵荣声 著

责任编辑:陈爱丽 终审:周诗健

封面设计:王存忠 责任技编:刘祥玉 责任校对:陈爱丽

气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6 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印张 字数:224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00 定价:10.50 元

ISBN 7-5029-2077-3/G · 0627

序 言

周 游

荣声同志是我 30 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那时我们都处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黄金时代，他念的是法学院社会学系，我念的是文学院新闻学系，虽然我们同级不同系，但是非常投契。首先因为我们都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较早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战斗的风暴中结成真诚亲密的友谊。其次，我们都爱好文学，都喜欢泛览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并且都喜欢动笔写点文章，这就开启了我们的心扉，彼此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后来又由他的介绍，使我参加“左联”，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燕大周刊》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号角之一，他担任 1936~1937 年度周刊的主编，我和郭心晖同志担任编委，每周一册数万字，对于功课沉重、救亡活动繁忙的学生说来，的确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但是我们干得很起劲。那家印刷所没聘校对，周刊从小样到清样，需要校对三遍，他只好挤出时间，每周在印刷所自己校对三个下午，近一年时间没有间断，他那种踏踏实实认真负责做工作的献身精神，那时已经表现出来。

他常写时评杂文，也喜欢写通讯，无论哪种题材，他都政治热情饱满，新闻感觉敏锐，文字朴实流畅。1937 年 4 月，他和另外几个同学追随斯诺先生的足迹，秘密访问陕北苏区。他所写的陕北通讯，乃是继斯诺先生在国外发表的英文通讯之外，第一个用中国文字在白区报道延安的通讯，引导当时青年们奔赴延安，曾经起到过良好作用。

他对于抗日战争非常积极，“七·七”事变一发生，他即前往卢

沟桥战地采访。后来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他辗转南下，最后到达山西临汾。1938年春，我们曾在临汾见面。当时我是前往延安路过临汾，他则已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该团的通讯股长，那个时候新华社尚未成立，西战团在前方做通讯工作，重要而且有意义，他本来可以发挥所长，写出不少好文章来的，可是机会不巧，党需要派他去做另外的工作，他只好悄悄地走了。他舍不得新闻报道工作，对于这一专业说来，那时他说觉得已成为“一棵未出膛的枪弹”^①。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战场重点山西，有三方面的中国军队。一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二是阎锡山的晋绥军；三是国民党嫡系将领卫立煌所统率的中央军。过去内战年代，卫立煌是一个剽悍凶狠的剿共将领，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派卫立煌担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既让他和日本兵打几下，为国民党争一点在华北抗日的名声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又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乃是派这个剿共老手挟其重兵监视八路军，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相机吞并八路军。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为了保证八路军不受暗害，抗日不受掣肘，为了八路军的军饷弹药不被克扣，顺利建立敌后根据地不受阻挠，我们必须向这位剿共将领做很多工作，向他仔细宣传解释我党的救国救民的政策，解除他们不必要疑虑；了解他们的动向与内幕……由于荣声同志和卫立煌有点同乡关系而且在他们的司令部内有熟人，我党便派遣他前往卫立煌身边活动去了。他身负秘密任务进入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以后，为了不暴露，必须装扮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的人，既不能写文章投稿，更不能与进步朋友进步报刊联系，从此以后我便见不到他写的片纸只字，也没再见到他这个人了。一晃就是10年。直到北平解放，有一天他忽然来到我的家并且住在我的家里，老友重逢，倍感亲切。这时我才知道他在抗日战

^① 《一棵未出膛的枪弹》是1938年春天丁玲同志所写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惋惜地记叙一个青年战士未上战场即先死去。

争和解放战争年代经历了许多危险,做了许多工作。^①

此后他不幸的遭遇接连而来,1951年他所在的单位未经详细调查,即给他作出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结论,使他陷于艰难的困境。他只知全心全意当“驯服工具”,“个人服从组织”,只知辛辛苦苦地做工作,从来没有“自由主义”,在我面前讲一句自己的不幸,但他那种坎坷处境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于1952年奉命创办《北京日报》时,曾想劝他到我们单位来帮忙,以便发挥他的特长,可是他的组织观念很强,不愿向所在单位领导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因而我的私愿未能实现。数年之后,他又遇到与许多知识分子相同的厄运,被戴上“桂冠”,下放劳动,一去就是20年,经过风风雨雨,直到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他的冤案才彻底平反。他不但1957年没有过错,而且查明他的全部历史,自从1936年入党以来,每一个阶段每一年,他都按照党的指示,一心一意在做革命工作^②。也查出造成他的历史错案的原因,乃是由于1951年他所在的机关,不知道我党在白区还有“绝密”的工作人员,甚至没有到遣派他进国民党军队的军委总政治部和在白区直接领导他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去问过一声,便轻易加以否定,因而让他无缘无故进入悲剧。如今悲剧是不存在了,不实之词也早更正了,但是年华易逝人也老了,白发盈巅,匆匆已过古稀之年,再想走笔为文,记叙祖国新貌,已经困难了。

因而我对于他搜集青少年时期写的文章,和回忆青少年时代活动的文章编成了一本文集,是有兴趣,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在

^① 他在卫立煌那里活动的情形详见他所写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此书1984年由全国政协文史出版社出版。

^② 刘子久同志在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忆少奇同志》一书中写道:“刘少奇同志根据我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结论是,军运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而不是一般士兵。为此,作军运工作的同志一个先决条件是看他能否在他的工作对象身边长期地呆下去。否则,什么工作也无从谈起。为此,刘少奇同志斩钉截铁地对那位有可能在卫立煌身边长期呆下去的同志说,你在那里长期呆下去就是胜利。……这个同志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在卫立煌及其部属郭寄桥那里一直工作到全国解放。这个同志利用他的特殊地位作了一些别的同志不能作的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工作。”

这些文章中焕发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读了自己也觉得年轻起来。祝愿他健康长寿，祝愿他永葆青春，发挥余热，继续写出一些作品来。

前 言

中国古代有不少学者文人，到了晚年，常常“悔其少作”。他们年事既长，阅历增多，学识丰富了，思想成熟了，回顾年少时所做的文章，看出自己过去的幼稚和浅陋。这种懊悔，是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的，其中包含有认真负责、严于律己和学后知不足等几层意思。

我过去写过一些通讯之类的文字，还够不上称为“作品”。那时候学识不足，观察世界有局限性，没有认真采访调查，匆匆命笔，浮光掠影，内容贫乏，把许多好题材糟蹋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既然我赞成“悔其少作”，为什么现在又把自己过去那些不成熟的东西找出来，编印成书呢？

第一，我这个人机会凑巧，从出生、成长到衰老，欣逢中国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数千年历史中风云激荡最紧要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从日寇入侵、河山破碎的最低点，经过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开国以后开始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我都躬逢其盛，亲自见到不少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亲历的场面。虽然文章没有写好，仍然记下一鳞半爪，零碎地留了点时代的痕迹。这是我的幸运。近年许多老记者同志们，出版了多种《×××通讯选集》和《历史的脚步声》、《时代的眼睛》、《一个记者的经历》等书，花团锦簇，佳作纷呈，我受到启示，也把少年游踪，辑录成册，留个纪念。虽个人鸿雪印迹，但多少反映现代中国动荡的风貌。

第二，我开始写通讯，始于“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正式干这一行，仅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当了三个月的记者。从1938年春季开始，我接受党的派遣，进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从事秘密活动，我服从工作需要，只好牺牲自己对于写作的爱好，暂时搁笔，而把期望寄托于未来。解放以后，我以为这一回可

以一偿夙愿了，哪知进入工人日报，又服从工作需要，把多数的时间用于帮助工人作者写稿或替劳动模范代笔，仅得一年多的时间，访问南北建设工地，写了十几篇通讯。不久，反右派的狂风忽然吹来，我也被波及，自此与纸笔无缘，等闲熬白了少年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万象更新，我身上的冤案错案都已改正，在这迟来的春天，我想我一辈子想当记者的愿望这一回定能实现了，实际上果然实现了。只可惜我在二十年灾难当中，身体已经受到损伤，当1978年冬季我高高兴兴到葛州坝工地采访，第一篇稿子还没有写成时，即在兴奋当中患脑血栓病，被送入医院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很短暂，想不到这么容易就结束了我一生热爱的记者生活。对于一个出师未捷身先垮的人来说，敝帚自珍，过去不成熟的文章也成了珍贵的东西，舍不得抛弃。

我离休以后，疾病少痊，零碎写了些回忆录。有些和少年时所写的通讯接近者，也选入此集，填补历史的空白。因此全书各篇的次序，按文章内容的年代先后排列，而未按作品的日期排列了。

目 录

序 言

前 言

“一二·九”运动轶事四则	(1)
“一二·九”运动中的《燕大周刊》	(7)
他青年时代的足迹	(16)
肤施(延安)的话剧与“活报”	(20)
沿着斯诺的足迹	(27)
卢沟桥劳军采访记	(68)
炮火声中的北平学生	(75)
烽烟中之故都	(78)
为了燃起大别山抗日救亡的烽火	(82)
西北战地服务团散记	(93)
西线上的一个盛会	(110)
正太路边	(117)
深切怀念少奇同志	(122)
界首船	(142)
蚌埠码头大翻身	(161)
风雪过秦岭	(176)
巴山故事	(183)
空山管弦乐队	(188)
向跟洪水斗争的英雄们致敬	(193)
荆江分洪记	(198)

DK94/32

一个鞍山人.....	(206)
在青年高炉上.....	(209)
路是人走出来的.....	(214)
他为什么办法多?	(221)
钻探机边二十四小时.....	(226)
把汽车制造厂迅速建造起来.....	(232)
看木偶戏记.....	(238)
一个工会主席.....	(241)
后 记	

“一二·九”运动轶事四则

一、催泪弹

在“一二·九”运动中两次示威游行之后，北平学生的中心工作是南下扩大宣传。参加南下扩大宣传第三团的各校同学们，为了避开军警的阻挠，于1936年1月4日上午十时，在北平西郊一个偏僻的村庄蓝靛厂集合。然后排成长队，高举团旗队旗，庄严宣誓，冒着风沙严寒，深入农村去宣传。

各校有许多同学到蓝靛厂来送行，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穿着豹皮大衣的矫健的佩格·斯诺，更是早就来了。斯诺邀请了几个外国记者来采访和拍照，还动员了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在北平的摄影师拍电影。斯诺和燕京大学的同学很熟，临行递给燕京大队队长陈翰伯一包赠品。同学们问这个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盒子里面是些什么？斯诺笑着说：“是催泪弹，要是军警来伤害你们，你们就可以用它自卫。但是现在不可以拆开。”

我们队伍南行，沿途宣传，天黑走到卢沟桥，第一夜寄宿在宛平县简易师范。有的同学想拆开斯诺催泪弹的盒子看看，因为当晚要和师范里的老师们座谈，并且要去拜访驻在卢沟桥的二十九军连长，没顾得上去拆。第二天我们走到良乡，住在第一完全小学，因为帮助良乡各校教职员成立救国会，又没有顾得上去拆。第三天我们走到琉璃河，天还没有黑就歇下来了，同学们还是忘不了这个催泪弹，就动手去解盒子外面的绳子，揭开一层又一层的牛皮纸，最后揭开盒盖，哈哈，哪里是什么催泪弹，锡纸里面是一大盒巧克力糖。在哄堂大笑之后，大家分而食之。

斯诺对于学生运动的热情是令人忘记不了的。他馈赠这盒叫做“催泪弹”的巧克力糖和他当时风趣的玩笑话，到了若干年以后，

我们也记忆犹新。

二、化妆术

1936年春季,“一二·九”运动蓬勃兴起后,中共西郊区委准备建立“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西郊分区部,让清华、燕京两个大学的党支部派人商量筹建。当时我在燕大党支部负责“社联”工作,数次在圆明园废墟上跟清华做“社联”工作的同志秘密接头。

我们是按照区委约定的时间、地点、暗号见面晤谈的。第一次清华来接洽的人身穿灰布长袍、布鞋,蓄长发,留着背头,讲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第二次清华来接洽的仍然是这个布衣布鞋南腔北调的同志,只有一点与前次不同,就是头上已剪成平顶头,头发很短。第三次清华来接洽的人还是那个同志,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的头发又变长了,不是平顶头,而是背头。

我们谈工作是认真严肃的,不插闲言戏语。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为了保密,是不可以向对方乱问别的问题的。那天我实在感到奇怪,在谈完正事之后,我忍不住多嘴说:“你的化妆术很不错。”

“什么化妆术?”他显得有些愕然。

我说:“今天离上次见面才一个星期,怎么你的头发又长得那么长呢?”

这位同志淡淡地笑了一笑,若有所思,并没有解答我的问题,匆匆握手别去。这一时期北平学生团结了大批进步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立了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就不需要再扩大“社联”这种完全秘密的外围组织了,因之我们接触中断。但是我一直记得清华这个同志,平顶头一个星期就能长成背头,真奇怪。

七·七事变之后,平津沦陷,南北路断,我搭乘开滦的运煤船到了上海。在前往山西八路军之前,为长期抗战作准备,我顺路先到离别多年的故乡安庆省亲。没想到在铺着青石板的大街上,碰见了这位清华同志。陪我逛街的乡亲给我介绍,这位老兄就是我们安

徽省著名的清朝桐城派古文大师方苞的后代，住在附近，可以到他们府上去坐坐。我们进了方家大门，才揭开我心中的迷，长头发和短头发乃是两个人：方琦德、方珂德，为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面貌相像，口音相似，同样布衣布鞋，无怪我在圆明园把他俩当作一个人，怀疑他会搞化妆术。

安庆原是国民党CC派重要据点之一，如一潭死水，到了抗战开始后两个月，还没一点群众性的抗日活动。不久，外地还乡的流亡学生组织了宣传队，按“民先”的做法活动起来。后来这些青年又组成工作团下乡宣传，终于团结了一批优秀青年参加新四军。自然，这方氏两兄弟，从中起了领导作用。

三、牢狱之花

“三·三一”抬棺游行是各校同学在北大三院开郭清追悼会受到军警包围，为了冲破白色恐怖，仓促上街的。游行未远，就在北池子大街南头被军警打散。燕大党支部书记王永祺（王明远）同志原先和我并排同行，因返身搀扶被摔倒在地的女同学自己未及时转移，以致被捕。

过了些时候，永祺同志出狱，回校后首先把他藏在袜子底下的一张纸掏出来给我。展开一看，原来是他们囚禁在北平陆军监狱中所创办的“一个牢房传一个牢房，一手传一手”的秘密刊物《牢狱之花》的一页。我看了非常激动，特别欣赏这上面的一首诗，它不止是狱中爱国青年的呼唤，而且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整个北方青年的心声，还表现了全中国青年对于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红军的渴望。我立即加上按语，把这首诗公开发表在我所编辑的《燕大周刊》上面，因而把它保存、扩散了。

1980年我按照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编辑部的命题写回忆《燕大周刊》的文章，我特别选载了这首诗。但是很抱歉，我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姓名。1984年与黄华同志谈起往事，我才较详细地知道一些有关《牢狱之花》的事情。“三·三一”那天黄华同志

被捕，和一个月以前入狱的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同关在一间小牢房内。由于另一个被捕的同学——民国大学学生王其梅同志（原名王时杰，解放后曾任新疆自治区工委书记，十年动乱中含冤而死）在监狱内做勤务工作，到各个牢房中扫地送饭，偷偷带来铅笔头和白纸。当时担任燕大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并为中共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黄华同志，掀开被褥，以木板床为桌子，双脚拖着七斤半的铁镣，坐在地上编写起狱中小报《牢狱之花》来。狱中向来不许看报，禁带报纸入监门，但是燕京同学用英文报纸包东西送给黄华，狱卒不知这也是报纸，没有扣留，黄华就把英文报纸上的新闻摘要写在《牢狱之花》上，中间还有各地学运动态。张申府教授讲唯物辩证法，讲困难前面就是光明的道理，鼓励难友们树立斗争的信心。张教授讲得很长，黄华节录其中精采部分，还标上“学术专栏”的栏目。在通讯一栏，刊登各个牢房中的新闻，有人投稿说“×号子（牢房）里的窝窝头有剩余，谁要？”充满着友爱，也解决实际问题。文艺栏刊登的《野性的呼唤》一诗作者是谁，黄华已记不得了，也可能录自墙壁上的题壁诗。

（原载1985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四、追悼两大文豪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北平有些学校里成立了文学团体，北平“文总”（左翼文化团体总同盟）和“左联”积极领导学校中的文学爱好者，做了许多工作。

50年前，1936年6月18日，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奠基人高尔基逝世。报上登出这一消息后，引起很多人、特别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们的注意，北平“文总”认为高尔基对于革命文学有巨大的贡献，举世同钦，应隆重追悼。而且开追悼会也是对青年们进行革命教育、介绍苏联的好机会，便通过地下党的秘密关系，派一个名叫芦荻的同志来和燕京大学党支部商量，设法借用燕京大学

的礼堂开追悼会。自从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所谓“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以来，敌人加强了反动的血腥镇压，如在北平城内开一个较大的悼念苏联革命文豪的追悼会，必冒军警捕人的危险；只有借用美国教会兴办的燕京大学的礼堂，比较安全。燕大党支部便转托燕大学生会出面向学校当局借礼堂。我们原先估计借礼堂追悼红色文豪需要费很多唇舌，没想到燕大校长陆志韦非常开明，他一闻来意便慨然允诺，于是北平文化界追悼高尔基的大会便在七月上旬顺利地举行了。

追悼会上主要的发言人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曹靖华。曹靖华介绍了高尔基一生的战斗历程及其主要著作内容，介绍了苏联文学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五四运动以来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曹靖华最后希望中国青年好好学习高尔基，要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那样无所畏惧，迎着暴风雨前进。这次追悼会开得很好，会后在许多青年中掀起一阵高尔基热，《母亲》、《我的大学》顿时成为大家抢着看的好书。北平有几个“民先”队基层组织还把这些书定为“民先”队员们的必修课程。

高尔基逝世以后四个月，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坛上的巨星陨落，鲁迅先生在上海病故。鲁迅之死在青年们当中引起广泛的由衷的悲痛。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燕京大学学生会出版了一本名为《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的书，派我充当了此书的编辑。

此书本来想在介绍鲁迅先生的文学著作之外，着重介绍他的革命思想，包括曾经作了哪些战斗，打了哪些落水狗。我们约请几位学者写稿，他们都欣然应诺，岂知他们提起笔来，才感到班门不易弄斧，没有认真地研究过鲁迅，悼念的文章也并不好写。因之我们的组稿计划未能完成。难能可贵的倒是两位碧眼黄发的西方人士先交稿，燕京大学欧洲语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先生，英国人，学识渊博，他对鲁迅先生作品研究如此之深，令人惊叹。我把谢先生的英文原文和译文并列于书中，一是想让燕京大学里的人能领略原文的好处，同时方便大学门外的读者，所以附上译文。

另外一篇外国朋友的文章是 H·Snow 写的,郭蕊译的《中国的伏尔泰》。文章一开始就说:“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坛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可以比拟于苏联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期的伏尔泰……是几个仅有的、在民族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的伟大作家。”

《中国的伏尔泰》一文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同年 11 月 25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版的悼念鲁迅逝世特刊中,转载了此文。《大公报》没有注明稿子的来源,却把作者的名字改成为埃德加·斯诺。

1936 年 10 月,斯诺已完成他在陕北的采访,但在鲁迅去世之日,斯诺还在途中,没有回到北平。大公报把《中国的伏尔泰》一文改署斯诺之名,可能是因为看见报上登出埃德加·斯诺发了一封唁电到上海,便以为斯诺已回家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斯诺的那封唁电,是海伦·福斯特·斯诺代发的。

H·Snow 是 Snow 当时的夫人 Helen Foster Snow 的简称,她也是一个美国记者和作家。她对鲁迅先生的作品也很有研究。《大公报》改名改得不对。1982 年 2 月 14 日,《光明日报》纪念斯诺逝世 10 周年,特地选登了 1936 年《大公报》所刊载的《中国的伏尔泰》,以讹传讹,也把作者的名字错为埃德加·斯诺了。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编过纪念鲁迅的书的事尚记得,作者名字被搞错则知道了。近年有个专门研究鲁迅的同志发现《光明日报》上《中国的伏尔泰》一文作者的署名和《纪念文化巨匠鲁迅》书上的署名有出入,来函见询,我翻阅了一下有关材料,才写了以上几句话。

(原载 1986 年 9 月 19 日《北京晚报》)